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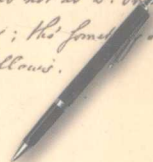
Lena Dominelli 著

林萬億 審訂

林青璇 趙小瑜 等合譯



4th I saw I spoke Brins sword, tho' a 5th of
the first, the hope was not as I. I hope to
delineated in his Optics; the former resemble
it; being nearly as follows.



女性主義

Feminist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 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務

Lena Dominelli 著

林 萬 億 審訂

林 青 璇
趙 小 瑜 等合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 / Lena Dominelli

著：林青璇, 趙小瑜 等合譯. — 初版. — 臺北市：

五南, 2004[民 93]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Feminist Social Work：Theory and Practice

ISBN 957-11-3756-1（平裝）

1. 社會工作 2. 女性主義

547

93016724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

Feminist Social Work：Theory and Practice

作 者	Lena Dominelli
審訂者	林萬億
譯 者	林青璇 趙小瑜
編 輯	蔣和平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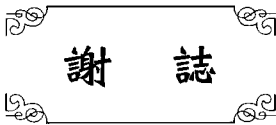
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 刷 2004 年 10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320 元

有著作權・請予尊重

致我的父親



謝 誌

撰寫一本書絕非一人可單獨完成的工作。知識是由人與人的互動中產生的，即便是一位與外界隔絕的作者，他的知識仍須仰賴他人的創造和傳播而來。同樣的，假若讀者與書中的文字無法有所交流，那麼寫作將變得毫無意義。但是，撰寫學術類書籍，對於作者和讀者間的關係產生了更深一層的影響，因為那建立在更為正式的學術要求基礎上。

在撰書過程中得到許多人的協助，我無法說出姓名，但希望對他們表達謝意：那些同意接受訪談的人；在教學關係中與我互相交流、相互交換資訊的學生；以及與我分享知識的同事們。而我尤其要衷心感激幾位付出心力的人：感謝馬瑞林·卡拉漢（*Marilyn Callahan*）在閱讀完手稿後給了我無價的支持與回饋，感謝我的父母用無盡的愛與智慧幫助我度過寫作過程的煎熬，感謝我的兄弟姊妹在我感到不知所措時給我的情感支持，還有大衛（*David*）和尼可拉斯（*Nicholas*），他們以愛、機智和同理心來面對我無數次的缺席。感謝你們，沒有你們的貢獻，這本書將是乏善可陳。

雷娜·多米耶利

Lena Dominelli

1999 年 夏

導論

在當今這個宣稱是後現代的世界中，女性主義似乎是過時了的字眼。西方國家的媒體確切地表示我們已經進入後女性主義時代，女性主義已成為過去。但對像我這樣的女性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當女性經歷貧窮女性化、性暴力增加、福利國家給付減少、生計與地位喪失的威脅，我對女性主義的主張已被實現而不再需要女人與女孩投入她們的精力來實踐的想法感到訝異。

當考量到工業化或低所得國家女性的日常生活，這個立場的荒謬就更明顯。在這些地方，貧窮是常見的，許多兒童、女性和男性為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像是食物、水和庇護所而奮鬥（UNDP, 1998）。工業化國家中，多數社區喪失製造業的基礎，年輕女性因而失去讓她們可以經濟獨立的工作機會，使得她們無法獨立；年輕男性追求高薪的技術性工作機會也消失了。喪失地位和目標的結果，使年輕男性逐漸變得暴力和社會隔離（Young, 1999）。因此，促使讓男性公平地承擔兒童與依賴老人照顧等家庭生活責任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女性在家庭、社區中承擔許多不被認為是辛苦的工作，致使她們感到疏離與艱辛。女性透過不間斷的工作，使她們保持身心合一，及無論何時都能抱持著明天將更美好的信念。女性和她們所愛的人將無憂地品味她們所選擇的生活。至少，這樣的夢想讓女性在櫥櫃中沒有足夠食物去餵飽嬰兒，或沒有錢去買祖母的藥物等諸如此類的沮喪、絕望的時刻

還能保持樂觀。女性在嚴苛的社會環境中存活的決心和創造更美好世界的願景，啟發我去促進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使之成為一個可以貢獻來協助女性希望改善所有福利的方法。然而，這個任務要透過促使他人參與和關心的過程來進行，而不是靠天真和已被決定好的方式來執行。

照顧是辛苦的工作，但它也是社會必需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它的價值是被貶低且視為當然的。女性很「自然」的去做某些事情。然而，女性常常為這些周而復始的動作而忙碌，當她們將全部精力都用在確保她們所愛的人的生活時，她們自己本身的需求往往容易被犧牲掉。社會工作者串通這些表面上看起來很容易，但實際上需要女性努力的工作，進而否認女性要付出代價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Callahan, 2000*）。此外，社會工作者傾向將女性視為自主的島嶼，認為女性有能量可以創造惡劣社會沙漠中的綠洲。傳統社會工作實務致力於改善苦於日漸窮困的社區的生活，但女性實務工作者很少關心造成女性困境的結構因素。儘管透過女性最大的努力和對彼此共同點的覺醒，可以協助女性橫跨性別分工而結合在一起，但社工領域中為數多過男性社工員的女性社工員卻期望女性能在嚴苛的環境中生存；如果女性無法做到就會受到社工員的嚴厲指責。

社工專業認為女性個人所擁有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力量會破壞他們已經擬訂好的處遇計畫，但專業介入女性的生活卻無情地病態化女性，並危害女性所顯露出脆弱的自我能力展現。這些事情都是透過以鼓勵女性獨立之名，並藉以確保女性不會依賴福利國家或其他慈善。執政者告訴女性他們必須提供的是「舉起手來領取，而不是到處施捨」（*Blair, 1999*）。沒有資源注入來領取，就像拿稻草來填補裂開的裂縫。這致使僅有的些微努力被破壞，並打擊那些有更大問題亟待解決的潛在案主。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主張透過將女性與消除結構的性別不公平作為實

務的核心來處理上述的議題。我會在書中探究這些信念。透過這樣做，我探究歷史文獻中對女性主義的貶謫，並檢討深植於（去）工業化與全球化世界中女性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助益。當前的場景已實質地有別於艾琳·麥里奧（*Eileen McLeod*）和我撰寫《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時候。但這些日子來，我依舊保持著樂觀——亦即女性主義者持續用來看待她們和她們所處環境的人與事的態度。

許多女性主義觀點需要仔細考量，因為女性主義涵蓋分歧的範圍和多元意見。因此，用我獨特無二的詮釋與解釋來談論女性主義將比較合適。我自己的觀點是採借廣泛的女性主義觀點的一個融合。儘管女性主義分歧且多元，不論是整體的分析和行動的需要，女性主義間仍有許多共享的原則，包括整合生活中個人和政治面向（*Millet, 1969*）、尊重女性的多樣性（*Hooks, 2000*）、尋求更平等的社會關係形式（*Collins, 1991*）、轉換現存不利於滿足男性、女性與兒童需求的社會秩序（*Adamson et al., 1988*）。我利用這些共同點來揭露經由女性生活所發出的多元聲音與透過女性行動所表達的差異。然後，我繼續檢驗社會工作者如何運用女性主義原則的理論和實務來與「案主」一起工作，而比起遵循傳統的社會工作意識形態更有效¹。儘管我主要的書寫內容深植於英國文化脈絡下，但自我反思的批判與延伸，使女性主義優於其他排他性的方法而顯出女性主義方法的與眾不同。此外，我也希望我所講述的可以得到其他女性的共鳴。

女性主義者對創造平等社會關係的想像

企圖用自己的觀點去改善女性生活情境的女性主義者，挑戰了幾世紀以來世界上不同國家使用不同方式去壓迫女性的不正義的社會關係（*Basu, 1997*）。像英國，「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成為終結自 1960 年

以來現代化社會中壓迫女性的不義現象的代名詞（*Banks, 1981; Tong, 1989*）。在工業化國家，女性主義者關注不同的議題，但她們對於保證女性正義的承諾促使她們投注精力在世界各地（*Jayawardna, 1986; Basu, 1995*）。

女性主義者不是用造成女性受壓迫的原因或如何終結壓迫的單一觀點來動員女性。儘管西方媒體對女性主義活動的報導置焦點於美國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以及視女性運動的特色為一個整體，多樣性仍是當代女性主義一個重要的特徵。這樣的見解貶抑了受邊緣化女性團體所付出的努力，特別是和貧窮勞工階級、族群化社區一起生活相當長時間的團體（*Dominelli, 1997a*）。媒體採取的策略多是在破壞女性主義對世界各類女性的政治訴求，導致對這種類型女性的多種努力不予認可（*Basu, 1997*）。

女性行動主義者繼續在各自關注的議題上努力，而不理會媒體如何描述她們的活動，區別不同團體間的「差異」與在達成目標上的成功仍不穩定。透過鼓勵批判各種沈靜的聲音，女性努力不懈地在找尋象徵上和實務上強調她們是「異中求同」承諾的方法（*Collins, 1991*）。老年女性面對年齡歧視議題（*Dorell and Siegel, 1987*）、女同性戀（女同志）需要頌揚女性多元的性取向（*Forster and Hanscombe, 1982; Basu, 1997*）、失能女性是橫跨各個女性族群的議題需要被認知到（*Morris, 1991; Begum, 1993*），與有心理問題的女性有要求心理福祉的權益（*Bayess and Howell, 1981; Ashurst and Hall, 1989*）。

女性主義運動的片段化意味著使女性不再受到壓迫的整體社會願景的多元意見可以被表達，其中有些意見嘗試狹隘聚焦於女性的社會行動下，來確保女性的多樣性不被忽略。舉例來說，黑人女性²透過主張女性的壓迫經驗是來自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來尋求擴展分析（*hooks,*

1984, 2000)。她們批判許多白人女性理論家的分析並未納入黑人女性（*Bryant et al., 1985; Bhavani, 1993*）。白人女性理論者的著作描寫出奴隸、殖民主義、種族屠殺的具體壓迫（*Maracle, 1996*），和強烈主張不應沈迷於某種壓迫形式優於其他的壓迫階層制度（*Collins, 1991*）。

被其他女性採用的女性批判立場乃是根植於女性主義者對自我反省，對不同女性群體特殊需求的覺察與回應的承諾（*Collins, 1991; Dominelli, 1991*）。批判提供女性主義有機會去：發展其他女性生活經驗的體悟，更深入的分析，承認其他女性同樣地可合法使用公共空間，尊重來自女性描述她們自身故事與對更好生活的渴望所表達的多元意見³。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者除了關注的事物有別於之前的女性主義者之外，她們對解放女性的方式也與早期主張「個人就是政治」的女性主義者有所差異（*Millet, 1969*）。關於「個人就是政治」，即是日常生活的私領域或以家庭為基礎的關係中和在公領域上所發生的權力關係是一樣的。她們相信理論和實務的整合是企圖去消滅目標和手段間的二元對立應持有的立場（*Brandwein, 1991*）。因此，她們強調活動實施的過程和想要實現的目標之間有直接的關聯（*Cook and Kirk, 1983*）。女性期待更美好的未來被認為是與現在她們所做的一切有關（*Dominelli, 1991b*）。此外，女性不再只要求能和男性平起平坐，她們更渴望有一個不同的社會秩序（*Basu, 1997*）。其一就是一個以人的福祉為社會議題中心的主張。儘管把這樣主旨放入希望中需要一些時間來形塑其樣態，但女性主義的新願景使世界能秉持平等關係，這是一種相互依賴、跨世代的團結與經濟系統的產物能符合人們需求而非破壞它們的平等關係（*Dominelli, 1991, 1997c*）。簡言之，從事這些事的傳統方式已不合適，以及其持續的再生產已不再被假定。

應用於男性與兒童的女性主義理論與實務

女性主義者在所有的公與私領域生活面向均強調社會關係的性別化本質。她們的分析在揭露許多的社會生活面向上男性因女性的犧牲而得到特權，像是男性因女性被排除在有酬勞動領域而得到高薪工作領域（*Armstrong, 1984; Coyle, 1989*）。女性主義研究也證明男性運用身體、心理與性等形式的暴力對女性施行社會控制（*Rush, 1980; Dworkin, 1981*）。儘管女性主義認為如果女性希望的話，也能擁有和男性一樣接近公共領域的權利，但有些女性主義者則想要男性擔負起許多傳統由女性從事的私領域工作（*Segal, 1983*）。包括家事、兒童照顧和老人照顧（*Walby, 1990*）。然而，其他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將男性納入女性主義活動中是有疑義的，而且主張任何情境下女性主義者都不應該和男性一起工作（*Sofanas, 1971; Jo, 1981; Frye, 1983*）。

所以，女性主義對現狀批判是為了要以終結犧牲女性而得來的男性特權，因為那是不公正的。難過的是，對這樣立場意涵的體認引起了希望保持特權的保守派男性的害怕（*Brooks, 1996*）。這些男性不歡迎接受使他們生活更豐富的冒險，反而缺乏遠見地固著於給予他們不受挑戰的統治權的神話式過去（見 *Bly, 1985*）。他們致力於成為反女性主義者，努力抨擊女性主義，並破壞他們視為降低男性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的努力成果（見 *Lyndon, 1992; Farrell, 1994*）。

更先進的女性主義團體主張女性若要得到真正的自由，男性必須由他們堅持的父權式社會關係的束縛中解放他們自己（*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 Collins, 1991*）。因此，女性主義者試圖將男性與兒童視為她們社會行動的受惠者。關於兒童，這意味著承認兒童是擁有不能被剝奪權益的個體（*Clinton, 1996; Dominelli, 1999*）。有些女性主義者企圖去找出可回應

女性但不會損及兒童的方法（*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其他的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符合女性與兒童的解放需要是困難的，需持續努力去調和女性生活情境中的矛盾（*Wise, 1985*）。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發現國家扮演利用女性照顧專業去控制其他女性的角色（*Wilson, 1977*），這個也被認為是不能接受的（*Marchant and Wearing, 1986; 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儘管這樣的體認難以理解，女性主義者企圖在沒有壓迫的情況下納入這個觀點，亦即，女性主義者不企圖去克服所有的壓迫——就男性來說，女性不過是取代他的另一群體；就女性來說，不過是男性或另一女性團體掌控其他女性。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feminist social work*）由女性主義的社會行動中產生，藉由女性在她們自己的社區中和女性一起工作而實現（*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目標在於透過連結女性個人的困境與因著她們的社會位置和地位而來的從未述說、私人的不幸來改善女性的福祉。這意味著私領域的問題將被重新定義為公共事務。儘管其他的社會工作者堅決主張社會創造個人不幸；例如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阿特麗（*Attlee, 1920*），她最早認為女性的問題是根植於她們的社會位置和女性的角色。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創造是女性主義行動者更普遍地利用女性主義的頓悟，並把女性主義的頓悟納入她們自己獨特的理論和實務的圖像中，因而女性主義也促進女性主義學術、研究與實務間的互動關係。

我定義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為一種社會工作實務的形式，其將女性的世界經驗當作分析的起點，焦點則放在連結女性在社會的位置與個人困境，回應女性特殊的需求，創造「案主」與工作者之間的平等關係，及處理結構的不公平。全面滿足女性特殊的需求和處理女性複雜的生活——

包括許多緊張和各種影響女性的壓迫形式，就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全部。其焦點在於對社會關係相互依賴本質的關注，確保女性與男性、兒童和其他女性互動的需求滿足。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是挑戰性別盲理論 (*gender-blind theory*) 和將女性視為男性衍生物的實務工作 (*Harding, 1990*)，這樣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在所有人的掩護之下無性別意識地傳送了男性的思考、生活與工作方式。在社會工作中，這些被代之以女性中心取向 (*woman-centered approach*) (*Hanmer and Statham, 1988*)，以倡導敏感、具性別化地回應女性「案主」和女性工作者的需求。最近，女性主義社會工作更徹底地將男性納入她們的理論和實務中 (*Dominelli, 1991; Cavanagh and Cree, 1996; Orme et al., 2000*)。

然而，女性位置的概念化並非無可挑戰。*Ramazanoglu (1989)* 質疑視女性為單一、一致類型的正當性，她認為這種「本質論者 (*essentialist*)」忽略了女性「種族」、身心障礙、年齡、性取向和其他社會部門對性別關係的影響，而無視這些女性承諾去檢驗其生活的社會情境。另外，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女性主義實務，其更強調個體間在互動過程中的語言和權力，包括「案主」與社會工作者的關係 (*Lloyd, 1998*)。

本質論已被標籤為不利於「古典」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文本 (*Brook and Davis, 1985; Marchant and Wearing, 1986; Burden and Gottlieb, 1987; Hanmer and Statham, 1988; 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 Langan and Day, 1992*)。創造一個可應用到所有女性的事例是困難的，有些明顯強調廣泛的社會分工，亦即在任何既定地區的女性生活的範圍較其他人來得寬廣：*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 3-4, 27-30)* 認為分析中應該要採取這樣的多樣性；*Langan and Day (1992)* 的解決方式是在每一個章節分別去檢驗每一個社會分工。

女性的確擁有不同的被壓迫經驗。因此，當我接受後現代的提醒而不對整體中的這個部分有所混淆時，對本質論的指責是一個很大的提醒。當不同情境下的人們嘗試為特定目標建構共同點，以及凸顯對系統問題採一般理解其所欲強調的重點，這正是充斥著「本質論」對現實的建構的慣常論述，亦即如 Hartsock (1987) 和 Harding (1990) 所說的「策略性的本質論 (*strategic essentialism*)」中的日常版本。這是部分且暫時的產物。為了創造適用於所有情況下的主張，後現代的分析也未能承認存在於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之間的差異。就這個差異來說，我主張女性主義者必須不迷失在連續性或特殊性中，以區辨來自不同女性經驗的歧視模式。因此，很難去支撐「本質論」是批判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主要缺點的論調。

就一門專業而言，社會工作認為處於社會情境中的個體是獨一無二的。不去本質化個人或將個人視為同質類屬中的一個成員的反應方式是少有的情況。透過個別與集體行動來提高女性、兒童和男性的生活以連結女性主義對社會變遷的承諾，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之所以能超越後現代理論家對片段化、個體認同的支持的優勢。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肯定被個人主義視為無用摒棄和犧牲的集體性團結 (Dominelli and Jonsdottir, 1988)。個體的認同可以在鬆散的廣泛集體中得以保存 (Haber, 1994)。

對社會工作者來說，另一個女性主義的優點是不可少的，即女性主義承諾社會變遷以使男性、女性與兒童能致獲更美好生活。社會變遷的承諾源於女性主義對理解和消除衝擊著某些特定群體的不公平模式的關切，並且明瞭圍繞在任何特殊群體的歷史中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卻把這些特色當作是過時的現代主義方案而放到歷史的垃圾桶裡。

重新定位社會工作

透過將性別置入社會工作中，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挑戰存在於傳統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中視社會分工為性別中立。女性主義者質疑傳統實務工作者依賴（白人）男性普遍的論述來作為衡量（所有）女性經驗的準繩，因而否定女性有其日常生活例行工作的特殊經驗，並預設了她們依賴的地位（*Pascall, 1986*）。女性主義行動者也質疑社會工作者並未考慮女性生活的社會情境，和否定社會工作純粹關切個體和其功能運作的假設。藉此，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質疑實務工作者對女性需求的回應。當發生使女性成為消極被動的受害者（*Hester et al., 1996*）；對尋求由苦難中解放的女性遂行各種形式的社會控制（*Ashurst and Hall, 1989*）；因困於無法滿足和不適合的關係中而受到嚴重情緒折磨的女性（*Marchant and Wearing, 1986; Thorpe and Irwin, 1996*）；以及否定女性有權選擇她們自己的未來（*Dominelli and McLeod, 1989*）等情事時，女性主義的批判於焉產生。透過將社會工作重新定位在全球父權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Dominelli, 1998*）與將焦點放在特殊場所中社會關係的性別化本質上，以及區辨多元脈絡社會面向（*Dominelli, 1998*），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者也檢驗社會工作實務實施（*Swift, 1995*）。換言之，女性不僅是女性。

當社會工作在了解社會工作立法架構與特殊國情、文化脈絡，女性主義者企圖辨認女性與其他女性共享的這些元素。依循著女性特殊地位，女性主義者藉由檢驗女性彼此共享的共同點，嘗試去連接女性間的溝縫。然而，將焦點放在女性間的相似處卻遭致後現代主義者的批判（*Rojek et al., 1988; Ramazanoglu, 1989*）。

右派理論家與政客利用貨幣主義的議題逐漸破壞大眾支持社會福利與驅使專業變遷的社會共識。社會工作被當作是福利國家的一部分，已

被推向政客尋求調和資本企業家追求資本累積的競爭需求，和勞工階級所需要的像是健康照顧和教育的社會資源間的新的位置（*Dominelli, 1999*）。當社會工作的床基已經敗壞時（*Dominelli, 1991, 1998*），女性主義透過學術和企圖創造替代性的服務以滿足女性身為女性的需求的社會行動，質疑福利國家的社會建構（*Showstack-Sasson, 1987*）。

巨視面的變遷涉及全球化和福利國家的國際化（*Dominelli and Hoogvelt, 1996*）。接著後續發生的動力在未經證實的方式下重新建構主流機構，此點在日常的社會工作實務的細節上得到佐證。在英格蘭，法定社會工作對「案主」群的傳統區分方式將被拋棄，轉而支持將對兒童與家庭工作和對成人工作分離的區分方式。如此二分案主群的方式忽略家庭中的「案主」群，且兩者也有重疊的部分。這樣的區分也無法滿足其他貧困的「案主」像是各年齡層的身心障礙者。同時，政府切斷和罪犯一起工作與社會工作之間的連結，並將觀護訓練自大學機構中移除，而可以接觸其他大學訓練以提供必要的知識基礎的工作場所也沒了（*Sone, 1995; Ward and Lacey, 1994*）。

市場導向所導致的後果仍舊不清楚，但已有許多人表達對拆散社會工作與保護管束的意見；包括：降低社會工作對行為改變的關注（*Ward and Lacey, 1994*）、忽略罪犯的更生保護（*Williams, 1995*）、缺乏回應需求的保護管束、社會工作的去專業化（*Dominelli, 1996*）。政府結合全球化的措施也經由貶低專業技術的價值而削弱了專業權力。總的來說，這些發展造成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有可能落入大眾議論紛紛中的「市井管家婆（*streetwise granny*）」替代的窘境；同時，女性主義也因專注於女性的需要卻忽略男性的需求而飽受質疑（*Cafin, 1995*）。此外，在社會工作歷史發展的重要時刻，這些左右了社會工作的發展，賦予我在本書中討論議題的時代意義，好讓社會工作者可以在此時運用上。

在其他層次上，社會工作也與這些轉變糾葛不清，有些運作甚至相互矛盾。第一個轉變是要求實務工作者儘可能在短期內協助人們尋求福利救助（*welfare assistance*）成為自給自足的市民（*Blair, 1999*）。藉提供捉摸不定的工作作為再訓練的誘餌時，這是將大多數基層工作者為女性的社會工作角色推向作為控制其他女性的家事、養育兒童與老人照顧能力（*Millar, 1999*）。第二個變遷是質疑任何情境下專業社會工作者對人們生活干預的必要性，並企圖將她們的活動歸類為無酬、志願的家事領域，藉此女性得以填補政府撤出服務的空擋。服務供應的重新定位指望女性扮演負責補救公共福利資源不足機制的角色。第三個轉變是服務提供的重新建構，使政府或家戶不提供的服務可以在市場中購買到。即使女性沒有足夠的財力資源去購買這些服務，但女性成為服務消費者的後果已漸不可避免（*Neysmith, 1998*）。

對某些女性來說，重新建構的措施有利於鼓勵她們成為成功的私人企業家，搶占提供福利服務的位置，而這些福利服務是其他女性願意購買的（*Lloyd, 1996*）。儘管薪資微薄，這些機會特別合適於因種族主義而被排除在勞動市場的黑人女性。第四個轉變是透過捍衛公共提供（*public provision*）的出售而將福利資源移轉到私人企業（*Dominelli and Hoogvelt, 1996*）。這些發展的綜合結果是女性失去她們在公共福利國家的工作，而轉受雇於薪資較低的私部門，同時工作條件也更加不安全（*Clarke and Newman, 1997*）。調整公部門的工作使某些女性喪失她們來自福利國家作為財務保障與依賴，導致女性工作者須由私部門獲得補助（*Ralph et al., 1997*）。

公共資金為基礎的服務提供給最需要服務的人們，因為他們缺乏資金去購買或處於不可能依賴比自己更窮困的別人來幫助他們的環境，導致大部分的人沒有資源作選擇。舉例來說，失去由英國政府所提供給 16